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广东井镇

王红艳◎著

G 农民工群体素描

GUANGDONG JINGZHEN
NONGMINGONG QUNTI SUMIAO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广东井镇

王红艳◎著

农民工群体素描

UANGDONG JINGZHEN
NONGMINGONG QUNTI SUMIAO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广东井镇农民工群体素描 / 王红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 - 7 - 5161 - 2923 - 4

I. ①广… II. ①王… III. ①民工—城市化—研究—广东省 IV. ①D422. 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4541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 林
责任校对 高建春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75
插 页 2
字 数 258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言 做出富有时代精神的真学问

当今中国处于急剧的发展变动之中，工业化、城镇化的浪潮席卷神州大地。这个时代是伟大的时代，它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中国，也改变着中国人生活和中国人的精神。当后世回过头来审视今天这个时代，这个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时代，会是怎样的感受？也许今天的我们难于判断后世如何评价我们的时代，但我却相信即使过了千百年后，人们还会关注今天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时代，就像我们依然关注秦皇汉武的年代。

今天这个时代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中国真正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的关键时期。人类在农业文明、农村社会里生存了千万年，在短短几十年、上百年内发生工业化、城镇化运动，从此进入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这是急剧而深刻的历史性的变革。因此记录这个时代、描述这个时代、研究这个时代，是这个时代的思想者、文化人的责任和使命，在我看来还是一份幸运。

和任何一个变革的时代一样，在她灿烂辉煌的另一面也有问题和阴影。就文化领域而言，因时代变动带来的困惑与不解以及由此产生的浮躁与肤浅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人身上司空见惯。特别是浮躁，这简直成了我们当中的流行病。对这样一个发生广泛而深刻变化的社会不是仔细地观察、认真地记录、深刻地思考，而是随意评说，妄加议论，每每公开发表一些三言两语的感受、议论并以此为乐，甚至据说能产生某种成就感。当然，并不是大部分学者、文化人都如此这般，这个时代更多的是沉下心来，认真思考、努力工作的人。所幸的是，我身边就有不少这样的人。

王红艳是我的同事，是一位年纪已经不是很轻的“年轻学者”。多年

来,她放弃了原本已经相当不错的生活状态,放弃了为当下许多青年学子所羡慕和追求的公务员身份,投身学术,泛舟学海。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她脚踏实地,不图虚名,扎扎实实地从基础做起,深入社会生活、走进基层、贴近“草根”,对于快速发展、深刻变动的中国社会进行认真而细致的观察、记录和研究,企求从中梳理出那些最终会引发社会变迁和政治发展的“蛛丝马迹”。多年来,王红艳的足迹遍及祖国大地,在东、中、西部的城市、乡村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特别是2012年春、夏,她在广东中南部地区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蹲点研究,专门对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个最为庞大和重要的新社会群体——农民工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观察。这项研究的初步的成果,就是呈现于大家面前的这本《广东井镇农民工群体素描》。

阶级、阶层问题研究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尤其是在近年来我们所做的多国政治发展比较研究中,我们发现: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因经济社会结构变动所产生的新社会群体是推动当代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社会变革的基本因素。当今中国正因工业化、城镇化而导致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结构变化。从政治学的角度观察,当今中国所发生的社会结构变动,形成了“三老”、“三新”六大社会阶层,即:干部、“老板”、“白领”、农民工、企事业单位员工和务农农民。其中,干部、企事业单位员工和务农农民,是原有的社会阶层与群体。尽管他们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也有了很大变化,但毕竟在原有社会结构和状态早已存在。“老板”即私营企业家,“白领”即城市技术、管理阶层,还有农民工,则应属于改革开放的产物,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新产生的社会群体。依据多国,特别是我们所做东亚及其他一些国家政治发展的经验,“老板”、“白领”、农民工将是改变中国未来,尤其是对中国上层建筑中的权力结构产生影响的最主要,也是最值得关注的三大群体。王红艳所做的这项研究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这项研究中,王红艳所采用的方法也值得注意。尽管这项研究的着眼点和意义更多的是政治的,抑或说是政治学视角的。但这项研究在本书中展现的更多是社会学方法。这首先和王红艳的学术背景有关,她曾求学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是黄平教授的高足。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一些社会科学的学科要赶紧“补课”,其中就有社会

学、法学、政治学等。几十年过去了，回头看，不得不说，社会学、法学“补课”的成绩不错。以社会学为例，中国的社会学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在吸收国际学术的理论方法与经验的基础上，基于中国实践的探索，已经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范式。我们所从事的政治学研究尚在艰苦努力与探索中。在我看来，中国的政治学应当向包括社会学、法学等学科在内的相关学科学习，结合本学科特点和需要，适当借鉴、采纳和吸收改造一些相关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王红艳的研究也许可以提供一个案例。

王红艳研究的内容与成果，价值如何？意义何在？相信凡此书读者都会有自己的了解与判断。我想额外再说上一点的是，由此书反映或代表的此类研究工作的意义。在我看来，凡以我们这个时代为研究对象和研究素材的实证性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都不应低估。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发生着快速而深刻的历史性变动的时代。变革的时代，是实践走在理论与知识前面的时代，抑或说，是理论与知识落后于实践的时代。因此，这样时代的学问就不同于以往那些较为稳定发展的时代，它们应当更加注重经验性的研究、实证性的研究，它们应当首先注重记录和描述当下的时代。人们时常强调要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要注意应用性研究和基础理论的研究的平衡。其实殊不知，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许应当换个视角来认识这类问题。在变革的时代，应用性研究，观察记录时代的研究恰恰是所谓理论研究的基础。在我看来，至少在我们这个时代，基础性的研究首先是经验性与实证性的研究，也许这就是这个时代做学问的特色与价值。

作为年轻一代的学人，王红艳的这类研究，以及她在研究中所表现出的那种脚踏实地、严谨治学的精神是值得鼓励、令人欣慰的。就个人而言，我亦十分看好这类研究在未来的价值。现在时常可听到一种议论，说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大师”。问题是什么是“大师”？人们又是怎样发现和认可“大师”的呢？其实，仔细想想现在为我们所认可的那些“大师”都是一些过去的人、逝去的人。在我看来，所谓学术大师、思想大师有两种，一种是那种可以穿透历史，贯通今生来世、闪耀千秋的思想家；一种是那些记述时代，以典型方式反映时代的学人。第一种大师无需多论，那是可遇不可求的。不过这类大师也往往是要经历漫长岁月鉴证，才能为人所识。我们一时看不到当下有这类大师出现也不必着急。至于第二种大

师，我倒认为未必那么可遇不可求。人是有文化记忆的动物，人类总爱瞻前顾后。试想，当岁月流去而后人回顾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他们有什么办法呢？毕竟人们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里。今后的人们需要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他们一定会选择最能够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地反映我们这个的文化记录以及记录着作为认识的途径。那么，能够如实地记录当下及其典型反映当下的作品，就有可能成为历史发展的里程碑。也许这些“里程碑”的树立者就是后人眼里的大师。

名利不足虑，所虑者是我们的事业。希望王红艳以及王红艳们能够一如既往，不为困难所动、不为名利所惑，坚守是为高尚，坚持就是胜利。

房 宁

2013 年初夏于北京大有庄

目 录

第一部分 综合报告	(1)
一 研究意义	(1)
二 研究起点	(4)
三 研究定位	(14)
四 研究发现	(16)
第二部分 调研日记	(56)
2012 年 2 月 18 日 出发井镇	(56)
2012 年 2 月 19 日 偶遇聚餐和婚宴	(60)
2012 年 2 月 20 日 和大家一起跳舞	(63)
2012 年 2 月 21 日 “找工作”	(66)
2012 年 2 月 22 日 “端盘子”	(70)
2012 年 2 月 23 日 考察“泼水节”	(74)
2012 年 2 月 24 日 访鞋厂技术主管小文	(78)
2012 年 2 月 25 日 访机械厂电工小旭	(83)
2012 年 2 月 26 日 登山记	(87)
2012 年 2 月 27 日 访塑料原料经营部老板小蓝	(90)
2012 年 2 月 28 日 访棋牌室老板阿萍	(94)
2012 年 2 月 29 日 陪小双相亲	(97)
2012 年 3 月 1 日 访“快三秒”的阿美	(101)

2012 年 3 月 2 日 初探“鸡婆街”	(104)
2012 年 3 月 3 日 访想成为“种树大王”的小陆	(108)
2012 年 3 月 4 日 考察“杀货部落”	(112)
2012 年 3 月 5 日 访家具厂安装工小林	(116)
2012 年 3 月 6 日 在“鸡婆街”小卖部闲聊	(120)
2012 年 3 月 7 日 访二房东老张	(124)
2012 年 3 月 8 日 访货车司机小熊	(130)
2012 年 3 月 9 日 召开小型女子座谈会	(133)
2012 年 3 月 10 日 访净水器专卖店老板小伟	(139)
2012 年 3 月 11 日 在收废品的老林家座谈	(144)
2012 年 3 月 12 日 考察“老虎机”和“转盘”	(150)
2012 年 3 月 13 日 和阿兰及她的孩子们在一起	(155)
2012 年 3 月 14 日 同值夜班的保安老尹和老邱聊天	(160)
2012 年 3 月 15 日 约请 DJ 实业公司老板	(164)
2012 年 3 月 16 日 访药店阿珠	(167)
2012 年 3 月 18 日 珠海“走亲戚”	(171)
2012 年 3 月 19 日 在中山市调研	(174)
2012 年 3 月 20 日 在中山黄圃镇调研	(180)
2012 年 3 月 21 日 在惠州市调研	(183)
2012 年 3 月 22 日 在惠州龙门县调研	(188)
2012 年 3 月 24 日 回忆与美容院元元的谈话	(191)
2012 年 3 月 31 日 回到井镇	(194)
2012 年 4 月 1 日 访待业在家的圆圆	(198)
2012 年 4 月 2 日 访铝合金厂普工老施	(203)
2012 年 4 月 3 日 访铝合金厂车队队长老彭	(206)
2012 年 4 月 4 日 同三个 90 后聊天	(210)
2012 年 4 月 6 日 “包打听”讲故事	(213)
2012 年 4 月 7 日 访打工的大学生小唐	(217)
2012 年 4 月 10 日 问卷设计以及调查“拾趣”	(220)
2012 年 4 月 11 日 在新莞人服务管理局座谈	(228)

2012 年 4 月 12 日 列车上的访谈以及“气生根”联想	(233)
参考文献	(238)
后记	(240)

第一部分 综合报告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亿万农民工^①以极大的热情和勇气，走出农村，走进城市（镇），积极投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为城市（镇）创造了财富，为农村增加了收入，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这一群体本身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的“产物”，通过他们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历程和变迁轨迹。这个新型社会群体，值得我们长期关注、重视和研究。

一 研究意义

从农民工群体发展经历来看，大致经历了三个关键性节点：其一，1992 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其二，1997 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其三，2004 年“民工荒”现象在全国的出现。以这些标志性的政策或事件为关键节点，可以将农民工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1978—1991 年，农民工的初步发展阶段；1992—1996 年，农民工的快速发展阶段；1997—2003 年，农民工的缓慢发展阶段；2004 年至今，农民工的公平发展阶段。^②时至今日，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明显特征的群体。这些特

^① 为了尽可能保持资料口径的统一性，本研究仍然使用“农民工”而不是“异地务工人员”等其他称谓。

^② 参见董昕《中国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历史与现状》，载《财经问题研究》2013 年第 1 期。

征使得这个群体更加“引人注目”。

（一）农民工群体的三个特点

农民工群体是一个特殊群体。其特殊之处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

其一，规模庞大。自农民工出现开始，群体数量不断攀升。时至2010年，全年农民工总量为24223万人；2011年，全年农民工总量为25278万人；2012年，全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6261万人。而且，规模还有逐年扩大趋势，2010年比上年增长5.4%，2011年比上年增长4.4%，2012年比上年增长3.9%。^②

其二，流动性强。自“洗脚上田”之后，农民工开始了远近距离不等的流动。近年来，尽管在本地务工的农民工（即在本乡镇内从事非农活动6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逐年有所增加，但是农民工群体当中的多数仍然在进行着跨省、跨市的远距离流动。2010年，外出农民工15335万人（其中举家外出农民工有3071万人），占到农民工总数的63.3%之多；2011年，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其中举家外出农民工有3279万人），占到农民工总数的62.8%；2012年，外出农民工16336万人，占到农民工总数的62.2%。^③

其三，地位失调。地位失调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形：第一，法律法规赋予的文本地位与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地位之间存在巨大反差。官方文本认为农民工群体是“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新型劳动大军”、“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工往往被认为是“被人看不起”的“只能干脏活累活的苦力”。第二，现实角色内部也存在巨大反差。与农村留守居民相比，这一群体是一个占有一定城市资源

^① 十多年之前，笔者提出了这一观点，具体可以参见王红艳《作为群体存在的农民工地位研究》，载中国知网“优秀硕士论文库”。

^②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以及《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载 http://guoqing.china.com.cn/zwx/2012-05/03/content_25293895.htm。

^③ 同上。

的群体，是农村的“精英”；但是，与城市居民相比，这一群体又是一个仅仅占有十分有限城市资源的群体，是城市的“底层”。

相比十年之前，这两种类型的失调情况有所改善，但是仍然没有得到切实和彻底的解决。现阶段又出现了第三种失调，即部分农民工新生代自我定位与非自我定位之间存在巨大反差。因为长时间居住在城市并且已经习惯城市生活，部分农民工新生代将自己定位为“城里人”，但是，现行户籍制度以及相关政策（或者加上身边“真正的”城里人）仍然会不时“严肃地提醒”这部分年轻人：你们仍然还是不能完全融入城市和共享城市资源的“农村人”。

（二）农民工群体问题关涉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大局

地位失调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地位失调可能诱致角色冲突。角色冲突包括两种类型：角色间冲突和角色内冲突。其中，前者指的是一个人所担任的不同角色之间发生的冲突；后者指的是同一个角色，由于社会上人们对于他的期望与要求的不一致，或者角色承担者对这个角色的理解的不一致，而在角色承担者内心产生的一种矛盾与冲突。角色冲突问题解决不好可能造成心理张力的积累，张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则可能生变而“爆发”。经验观察表明，在不少农民工身上都可以找到两种类型的冲突的痕迹，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而且，因为农民工群体具有规模庞大、流动性强的特点，这个问题更应该得到我们的重视。

为什么？

包括古斯塔夫·勒庞的研究成果在内的大量的心理学实验和观察表明，一个群体的内部成员之间情绪和行为是可以互相感染的，情绪和行为的感染会使一定的情绪和行动彼此相传，由一个体传染到另一个体，最后形成特定的群体心理。一旦群体心理形成，个体会不自觉地背弃既有行为常模，失去理智控制，听命于本能冲动的支配，而隐姓匿名境况下，冲动更加突出从而加剧动乱的程度。换言之：“群体人易因情绪传染而从众”，“群体人易因接受暗示而从众”，“群体是自我人格消失的野蛮人”。^①

^① 参见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陈天群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古斯塔夫·勒庞可能过于悲观，但是一个如此庞大的群体一旦形成某种共同心理，确实是件棘手的事情。而且，高频次的流动势必加剧情绪和行为的传染。简言之，地位失调、角色冲突可能导致心理紧张，心理张力累积可能爆发而演变成实际行动，而庞大的规模和高度的流动则可能使失调、紧张和冲突发生聚变，从而使得事态进一步扩大、升级和复杂化。也就是说，农民工群体三个特点之间在理论上存在相互作用和加强的关系，而各地不时发生的涉农民工群体事件用铁的事实不时表达着这一逻辑链条。

因此，农民工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直接关系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直接关系城市的“脏乱差”活计有没有人干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直接关系社会是否稳定乃至影响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大局的问题。如果引导好、“改造”好、运用好这一群体，这股力量就会切实成为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依靠力量，否则，这股力量可能成为一股游离于“体制”之外的强大对抗力量。

二 研究起点

也许因为群体本身的特殊性，农民工群体自出现以来，受到学术界“大家”的高度关注。“大家”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指投入农民工问题研究的学者很多，二是指不少知名学者关注和投入农民工问题研究。因此，关于农民工研究的学术成果可谓汗牛充栋。

（一）基本研究脉络

从研究角度来看，早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分析农民工群体出现的原由、阐释农民工群体的特点等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黄平先生主编的《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是这个领域和主题的力作。黄平先生在文中指出，农民的外出尽管是在“生存理性”（区别于“经济理性”）的驱动下进行的，但他们外出并不仅仅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意愿，还要受制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尤其是包括就业用工制度、

户籍身份制度以及粮油管理制度在内的制度性条件。^①

清华大学李强先生所著的《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也是这个领域和主题的代表性著作。李强先生认为,农民工是城市中的“边缘人”,他们有着自己群体的亚文化。造成边缘化的首要制度原因在于户籍制度,正是户籍制度的存在和作用使得传统的人口流动的推力与拉力的模型发生了变化。于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群体构成了“第三元群体”,这一群体与农村居民相比是一个占有一定城市资源的群体,与城市居民相比又是一个仅占有十分有限城市资源的群体,但他们始终只是一个新的身份群体而不是一个统一的阶级。^②

再晚一点,学界对农民工的研究兴趣发生了转变,基本放弃了对群体形成原因的分析,而主要关注农民工群体的权益保障和文化生活现状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而从不同角度提出一定的对策和建议。中山大学蔡禾先生所编著的《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来自珠江三角洲的研究》是汗牛充栋成果中的不俗之笔。该著作关注的几乎是农民工群体的工作、生活和学习“全景”。它以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资料为依据,以珠江三角洲为对象,对农民工的劳动权益、日常生活(包括收支情况、城市生活消费状况、社会关系、休闲等)、利益抗争行动、城市认同与迁移意愿、子女教育、社会保险等各个方面的状况进行了考察。^③

农民工“市民化”在较长时间内成为关注热点,不少学者投入不少精力。有学者认为,农民工市民化进展的缓慢,表面上是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乡土地制度等二元体制改革的滞后,但根本的原因还是改革这些制度需要付出相应的社会成本。作为一个特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一个转型时期的国家,囿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效率需求等原因,我国政府认为现阶段还没有能力承受制度改革过程中农民工的基本权利保障和城市公共服务享受的资金需求,因此无法将农民工市民化作为现实目标。

① 参见黄平主编《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云南出版社1997年版。

② 参见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③ 参见蔡禾编著《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来自珠江三角洲的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所以,农民工市民化的最核心难题就是其市民化过程中的社会成本问题。^①有学者尝试借鉴西方社会距离理论和方法,对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关系状况进行分析,继而尝试从制度经济学视角阐释了导致农民工与市民之间“中、远距离”实际的原因。^②还有学者从城市准入、就业、居住、子女教育、劳动权益等具体的领域考察农民工与社会结构的互构,同时,从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分化、代际差异、实践路径等方面研究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进程。^③

近年来,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不少人士着手研究新生代农民工^④的问题。有学者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稳定观”的培育,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面对外在客观环境、自身价值定位及事关切身利益的诸多现实问题时,对社会稳定具有双重影响,因此,必须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稳定观”的培育,引导他们为社会稳定发挥积极作用^⑤。《光明日报》曾经刊文指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是重大问题。因为,新生代农民工,作为边缘性特征明显的社会群体,作为传统二元社会结构中衍生出的“第三元”,在再社会化、在融入城市社会过程中,面临许多实际问题与困境。这些问题处理得怎样,不仅关系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自身发展,而且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具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第一,稳定就业面临困难,“频繁跳槽、漂泊不定”现象比较普遍,不利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第二,权益维护面临困难,“渠道不畅、群体性失语”现象比较明显,容易诱发法外维权。第三,精神文化生活面临困难,“婚恋不顺、文化生活匮乏”现象比较严重,不利于形成积极乐观

① 参见张国胜《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社会成本视角的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② 参见卢国显《农民工:社会距离与制度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③ 参见胡杰成《农民工市民化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

④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指当时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但是,不少人士认为80后农民工群体中,出生于1985年之前的与出生于1985年之后也有明显不同。

⑤ 参见董宁波、刘满意《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稳定观培育》,载人民论坛(总第384期)2012年11月28日。

的文化心态。第四，发展上升面临困难，“前途迷茫、焦虑无奈”情绪比较突出，技能培训和职业发展指导明显不足。第五，社会归属面临困难，“拔根农村”比较彻底、“扎根城市”力不从心，群体身份认同开始出现。^①不过，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最有份量的当属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形成和公布的一项成果——《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鉴于后面章节还有分析，在此不作赘述。^②

（二）经典研究视角

不管是早期还是当前，社会排斥—社会包容是很多学者在研究农民工问题时使用的经典理论视角。“社会排斥”的本意是种族歧视和偏见，指的是大民族完全（或部分）排斥少数民族，现在一般指涉已经握有社会权力的主导群体不愿意与弱势群体分享各类稀缺资源，而且，这种歧视和偏见建立在社会有意达成的政策基础之上。不管是早期还是当前的研究，一般都认定农民工群体是一个受到排斥的群体，因而这个群体往往被称为“弱势群体”、“底层群体”或者“边缘群体”。

不少研究认定导致这一群体弱势化、底层化、边缘化的关键原因在于户籍制度的实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则在于消除户籍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先生正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多年以前，陆老先生指出，解决和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以及消除在就业方面的不合理限制只是解决农民工表面的问题，只是“扬汤止沸”的作法而不是“釜底抽薪”的办法，农民工问题只能从“根”上治。换言之，即要统筹城乡社会发展，要解决三农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就一定要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而且“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早就在盼望户籍制度的改革了。户籍制不改，他们就永远不能转为正式工人，不能成为城市的居民，融不进城市的社会”。^③

黄平先生等则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户籍制度在保障农民工以及广大

① 参见章丽璠《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是个重大问题》，载《光明日报》2012年3月16日。

② 参见 <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00628/2352043.shtml>。

③ 陆学艺：《农民工问题要从根本上治理》，载中国社会学会网2003年11月3日，陆学艺：《农民与农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以及其他类似研究。